

神圣的使命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乌鲁木齐市委员会

神圣的使命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乌鲁木齐市委员会

序

言

吴敦夫

欣闻乌鲁木齐市政协编撰的报告文学集《神圣的使命》即将付梓的消息，我跟许多同志一样，非常高兴。这是献给人民政协 50 岁生日的一件很珍贵的礼物。

50 年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，但对每个人来说，却是很长的一段历史岁月。说到岁月，让人感叹。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，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了。他们老了，后头的一批一批的青年人又跟上来。是啊，在乌鲁木齐这片土地上，曾经有多少人为她播撒过心血和汗水，有多少人为她做过毕生的奋斗啊。当然，由于文集篇幅所限，我们无法看到更多政协委员的业绩，但仅凭文集中收入的 28 位委员的步履就不难看出，他们为乌鲁木齐的建设和发展付出的辛劳，他们没有愧对过去的半个世纪，乌鲁木齐不会忘记他们。

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的主体，过去他们做了很多事情，现在和将来仍有许多事情可做。这本书的问世，既对老委员是很好的颂扬，也对新委员是很好的激励。我由衷地相信，全体政协委员会一如既往，不辱使命，在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积极参政议政，为建设好美丽繁荣的乌鲁木齐，奉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。

一九九九年六月

《神圣的使命》编委会

主 任 王云和

副 主 任 李俊峰

委 员 李文杰 吐尔逊·艾买提 薛立柱

陈柏中 矫 健 周建明

主 编 李俊峰

副 主 编 李文杰 吐尔逊·艾买提 薛立柱

特约编审 陈柏中

执行编辑 矫 健 周建明

目 录

序 言

吴敦夫/1

首府城建第一人

李光明/1

希日甫江·大毛拉·阿吉印象

铁来克·易卜拉欣/12

清白为人一身正气

郭绍珍/25

刘竹溪别传

程万里/35

影子与人

谢纲振/48

老红军的赤子情怀

何树林/65

为了黄家驹的嘱托

李广智
/79

“电熔爆之父”叶良才

马锁成
梁小青
/95

阿訇马安泰

克 矛
朱又可/104

在黑色与白色之间

矫 健/117

西部边城的守望者

于秀华/122

不讲过去 哪知现在

叶尔克西·胡尔曼别克/134

水 缘

中国祥/146

维吾尔鹰

左增杰/160

四十年,为了母语纯洁的一字一音

张 红/175

迎接生命的早秋

潇 雨/180

舞蹈和生命

小 木/186

谱写人生的华彩乐章

杨晓芬/192

把心交给菜篮子的女人

赵 勤/205

博格达白绒山羊

马锁成
李广智/215

“中国的法布尔”记事

矫 健/229

吐尔根·依不拉音的视窗

武鸿鸣/236

任万钧:历史的见证人

郭小雨/243

浦江潮啊塔河浪

曾 捷/250

跃出神州的辉煌

苏金林/260

拨动爱的琴弦

夏 霖/265

方彦忠:就叫我大夫吧

西北平原/276

爱从指间流出

赵 勤/281

首府城建第一人

李光明

武振勋，男，回族，1921年生。九三学社乌鲁木齐市一届主委，高级工程师。市五~九届政协常委，六~九届政协副主席。

你叫我谈，谈什么呢？我这人一生都很平淡，就是和路、树、工程、城市规划打交道。就拿现任政协副主席来说，如果在党，早就退休了，因为无党无派一干就是四届，17年了你说这是党的信任，群众的拥护推举，这有道理，但我毕竟78岁了，还能干多久？你一定要让我谈，那就谈谈我个人经历吧。

我眼前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。他，瘦高个，一张开朗的脸上架着一幅宽边眼镜，头发虽已花白，但仍然粗壮透着精神。望着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，我真难以相信他已年近八旬。风风雨雨没有改变他爽朗的性格，人世沧桑没有磨灭他敬业精神。

有人开玩笑说我是乌鲁木齐城市建设第一人，我赶紧摆手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搞城建的前辈、能人多着呢，我算不上，最多算一名城建战线上的老兵。

可能是命运的安排，在那兵荒马乱的1938年，我本来考入迪化师范学校，学的是教育，本想“教育救国”，但毕业后我又鬼使神差考进了新疆土木工程专门教育班，学制3年，也就是现在的大专吧。那时的学校开始是苏联顾问授课，讲的是苏联的东西，后来学校又请了留洋博士，讲的又是欧美风格，反正学得很杂。好在那时教育也注重实践，学习期间我就负责过省一中校舍的翻建维修，那算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与“建设”打交道吧。

1944年毕业后，我来到了迪化市政委员会当了个小技术员。当时正赶上修建和平广场（即今人民广场），领导分给我的任务是设计、监造司令台（主席台）围墙、东西辕门及周围的沥青路。别的还好办，那沥青路咋修？光从书本上学过，没见过也没干过。好在我的一位老师有主意，他说用黑油块修。那黑油块是什么？就是克拉玛依黑油山上冒出来的黑油，风沙一吹结成了块，越聚越多，老乡就挖了拿来卖。我们用耐火砖砌了一个小炉子，点上火，将黑油块放在里面慢慢地化，化开了再掺上砂子铺路面。那东西还真行，碾压平整后又结实、又光亮。记得路刚铺好时，年轻工人在上面跳呀，唱呀，有的干脆在上面翻筋斗，那情景好象昨天发生的一样。那年，我刚23岁。这条路算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条柏油路吧！那路一直用到1955年扩建新路为止。

其后我又到了省公路局，职务是技佐，还是技术员吧。先后勘测、设计、监工修过的有干沟新线、哈密骆驼圈子公路、库尔勒至轮台新路、阿克苏至巴楚公路、乌伊公路上的呼图壁大桥和公路，反正一年四季尽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修路。那年代吏治腐

败，财政乏力，修的尽是土路，谈不上规模，上不了标准。

1948年春我又转到省水利局，任助理工程师。那一年让我负责库车县渭干河水利工程的勘察设计。我一到库车，当地老乡讲当年林县长（林基路）就想搞渭干河水利工程，但没有搞成就出事了（被盛世才逮捕入狱），言语中流露出对林县长的怀念。我那时对林基路等共产党人十分敬仰，听说是林县长要做的事，我十分卖力，早出晚归，又是勘测，又是绘图，忙了大半年总算把图纸、方案拿出来了。可一回到迪化，心就冷了。那是什么年代，国民党政权已基本崩溃，物价飞涨，一面袋子金元券只能买两个饅，谁给你出钱兴修水利？只好作罢。也就在这时，人们纷纷传说，要解放啦，解放军快来了。于是我回到家中，盼望着新中国的诞生。

二

终于盼来了解放。

解放军进城那几天，每天都能听到激动人心的口号声、欢呼声。真是家家说解放，人人谈新事。此时不少同学来找我谈参军去，我没去。因为我学的是城市建设，我要用技术为新中国出力。

1950年春天，我来到了迪化市工务局，具体工作是负责市政工程设计，道路设施的维修与养护。打这一天起，一直到1983年当政协副主席，我一直与城市建设、规划打交道。

这期间我的主要任务是规划修路。那阵子乌鲁木齐太难看了，老百姓说的“电灯不明，电话不灵，马路不平”是轻的；马路岂止不平，简直就是大坑小洞，说下雨天城门洞子淹死骆驼有些夸张，但淹死毛驴还真有过。修路，是我们的头等大任务，然而修路要钱，哪里去弄钱呢？还是市长饶正锡有办法，提出“筑路捐献”，大家出钱。当时那些个体工商户非常积极，捐钱捐物，人民

群众也表现了极大的积极性，纷纷捐款。我们又用“以工代赈”的办法动工兴建新路。我那时负责设计施工修建的有中山路、新华南路、解放北路、东大街、和平路、东风路，还有排水工程。那阵儿忙呀，白天晚上心全在路上，浑身使不完的劲。一是人年轻，有精力；二是当时口号叫“加快建设新中国”，有动力。路，一条又一条地修好了，尽管是碎石路，但平坦整洁，看着一条条新路修好，我的心情就特别激动，那感受比小时候过年穿新衣服还高兴。（说到这，老人站了起来，神情十分激动）1953年工务局改成建设局，我已是建筑管理科科长了。当时乌鲁木齐还没有规划，乱盖乱建的事频频发生。此时我想得有个法规，在领导的支持下，我开始草拟《城市建筑管理办法》，详细拟订城市建设中必须遵守的规章制度。在草拟这个办法时，我找了不少参考资料，照搬苏联的不行，欧美资料几乎没有，我就根据内地一些城市规划资料来搞，先后搞了一个月，又是讨论又是修改，最后交市政府批准，报省政府备案，得以颁布实施。

这是全疆第一个地方性法规吧。不管它是否成熟，实践证明，这个“办法”对以后的城市规划建设，对旧城区的改造，对市政全局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
1954年建设局局长调走了，上级任命我当副局长，主要管道路工程和园林绿化。这一时期修建道路工作全面铺开，由我负责主持设计和施工的主要工程有光明路、黑龙江路、钱塘江路、长江路、友好路，还开辟了新市区干道——北京路的路基工程。通过这次修路，乌鲁木齐已初具规模，已有现在的模样了。

接着我们翻修了中山桥、人民桥，修建了南门、北门、小西门街心花园，扩建了人民公园的人工鉴湖，翻修了阅微草堂、朝阳阁、湖心亭，开凿了登红山的台阶路（先是砖砌，后又扩建为

石板路)，在山顶修了八角亭。那亭子从设计施工到人工背料上山前后花了3个月时间，真是既艰苦又干得有意思。望着渐渐漂亮起来的边城，我对自己的工作总有一种崇高又踏实的感觉。

三

1959年以后，乌鲁木齐城市建设规划又上了一个新台阶，主要是两件事，一是修了自来水，二是进行大面积的绿化。

先说自来水。1958年底开始筹划，1959年春天在三甬碑打井建水厂，那时地下水位高，打下20来米就有水了。当时条件差，下的是清一色陶瓷管，最粗的50公分，细的只有20来公分，明知这样以后不够用，但没钱又没办法，只能是有多少钱干多少活，这就为以后的“拉链马路”留下了隐患。好在那时人口少，楼房又不多，边城人用上了自来水，自然也是一件大事了。

还是说绿化吧。1959年绿化是个高峰，全民动员，人人植树，那阵子真叫人高兴，眼看着一片片林子起来了，乌拉泊、羊毛湖、延安路、南公园、二工、三工……

最有成效的还是红山绿化。那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，59年动员上万人，上山挖坑栽苗。山上绿化，要水，要引水上山就得有水泵和管道，当时一无所有。总不能让栽上的树全死掉，于是，我跑去找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曾涤，我说要两台泵，他一听是绿化就批了，可管子他让我自己去找。我来到市通用机械厂，要了些铸铁管，尽管砂眼多，有点儿渗水，但总比没有好。就是靠这两台泵和那些有砂眼的铁管拉开了红山绿化的序幕，当年栽下的幼苗，春天一片碧绿，叫人好开心呀！从那以后，年年义务植树，通过十多年的努力，终于有了今天的红山公园，有了丰茂的林木。

当年与红山同时绿化的还有妖魔山（雅玛里克山），但妖魔山的绿化失败了，为什么呢？这里有个科学问题。

当年人们植树热情非常高，有人提出在妖魔山上绿化一万亩，但山上没水怎么办？引水，条件不成熟。有人讲没水也栽树，能活多少算多少，也许是大跃进年代的劲儿还没过去，领导脑袋一热说种就种。好家伙，数万人上山挖坑植树，一层层、一排排鱼鳞坑挖好了。没有树苗，咋办？有人提出种树籽，种什么树籽呢？沙枣。好，我们从南疆运来了 20 吨沙枣，连肉带核囫圇个儿地播了进去。树籽要水，可没水，有人提出用消防车送水。领导一句话，消防车上来了，也叫邪门，那天城中刚好失火，就是找不到救火车……妖魔山大干了一场，结果一无所获。好在那精神一直鼓励着人们，对妖魔山绿化没间断，可能正是这种努力追求的精神，今天的妖魔山已经开始绿了。

那阵子绿化最大的困难还有一件就是缺树苗，自己没苗圃，树苗由石河子、玛纳斯供应。这么大一个城市没苗圃怎能行，于是我决心自己建一所苗圃园。我转呀转，发现四工有一片荒地，而且那儿有全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，如果能利用处理的污水育苗，不是一举两得嘛！我的想法得到了市领导的支持，一下子搞了 3000 亩，两年后我们的树苗就自给有余了。现在这苗圃越办越好，不仅有普通树种，还有了不少观赏类型的树苗。现在看来，当时没花几个钱办了个大苗圃是对的，你看它对乌鲁木齐绿化多么重要，就连如今水塔山、清泉山绿化也有它的功劳呀！

你看我说得杂乱无章，可能是天性，一说到路、树，我就收不住了。你别见怪，这两样东西，已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了。哎，说到这树，我还要啰嗦两句。一场文化大革命，毁掉了多少林木。1966 年当时有 80 多万株树，文革结束，毁了三分之二，

可惜呀可惜，那成片的林木，现在连痕迹都没啦，叫人心痛呀！

咱们说说 1965 年吧，这是辉煌的一年，因为自治区成立十周年，有许多献礼项目。我负责做了三件事，一是修河滩公路，二是建青山苑，三是改造人民广场。

提起河滩，1965 年那是成片成堆的垃圾场，要拉走这些垃圾，恐怕车排成队一个月也拉不完。当时市领导决定修一条路，垃圾就埋在下面，两边栽上树。工程由我负责，还是老办法，义务劳动，万人大战河滩。那场面壮观呀，先后用了 1 个月时间修了一条西大桥到四桥的土石路，改变了河滩千百年来旧面貌。以后 1978 年改扩建成柏油路，两端延伸到 312 国道。当然，今天建成了高速公路，更是鸟枪换炮了。

青山苑当年也是一个大垃圾堆，又脏又臭，起初那儿有个小庙，庙坍了就成了垃圾场。又是群众义务劳动，这垃圾拉了一个多月，我们在那里植树建亭，终于成了今天绿茵茵的依山傍水的小风景区了。

说到改建广场工程，那我是有感情的。第一次建广场是我的人生起点，这一次由我主持改建，而且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向我当面做了详细交待，我真有一种当家做主人的神圣责任感。部队派来一个团为我们清理土石方，整整干了半个月。我按照方案，将广场三分之一开辟成绿化带和游园区，种植了树木，修建了花园，并创作了民族团结的大型群雕设计方案，广场将面貌一新。

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就在我精力旺盛、准备实施大盘绿化计划的时候，那场灾难性的“革命”来临了。抓我、斗我、批判我，说我“培植修正主义的花草是讲享受，就是修正主义分子”“反动权威”，跟谁讲理去呢？只好进学习班，下乡劳动改造，上“五·七”干校，一折腾就是十年呀。这中间也想做一些工作，但无力

回天，真是人祸大于天灾呀！

1971年我从“五·七”干校回来，分到了规划处工作，还是老本行，负责城市规划。

1975年到76年，我被派去搞乌河防洪工程和乌拉泊水库除险工作规划设计，忙了一年。对这项工作，我是太小心了。因为1953年8月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沿河滩滚滚而下，好象千军万马，冲毁了河堤，冲毁了河上的三座大桥，河两岸交通阻隔，我是目击者，也是抗洪的指挥者之一。所以在这个工程中，我们特别认真。那年修建了一个泄洪道，可泄100立方水。又修了一条引渠，可引50立方水进红雁池水库，还有50立方水可放进和平渠，这样3000立方的水库压力就小多了，加大了保险系数。

说到这里我还要说两句，长江大水是个信号，你别看乌鲁木齐缺水，一旦遇上大洪水可不得了，所以无论何时对乌拉泊水库的监测和防洪措施都不能放松。

嗨，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，但干什么都很认真。我不是战略家，但每件具体工作，我都要做得有头有尾。岁月不饶人呀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担任规划设计院领导工作，我的任务主要是带年轻人，冲锋陷阵的机会少了，但我的心还在路、树、工程和规划上……

四

你说我身体好，是的。不少人都说，“老武，你有什么养生之道吧？”我哪有什么养生之道，但我总结了一下，我这一辈子做人有三条，从不违背，所以我活得平静，活得快活，活得踏实，这也许是身体好的一个原因吧。

第一，我这人做事出于公心，不存私心。我对个人的待遇、地

位、金钱从不考虑。

做人要有原则。我的原则是要对得起公家，对得起自己，不做违心的事。记得1962年要精减几个人，开会研究，某领导就是要让某人下岗，某人不愿下岗，我一看不公平，会上便直言不讳。有人劝我，你又不是党员，是个技术干部，这样对待书记合适吗？我反问他，有什么不合适？我说的是真话嘛。

还有一次一位领导批了一块地方扩建工厂，那明明是一大块风景区用地，我当然不同意。后来这位领导在大会上发火：城建局有人反党，不听我的话。会一散，我直接找到这位领导，说我不是反党，我不听你的话是有理由的。我搬出了绿化法、森林法，说服了这位领导。他笑着同意了 my 意见，出于公心，有什么可怕的呢？

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不顺心的事，但只要不是为私利，总好解决。比如1981年我60岁了，那一年我有强烈的人党愿望，写了入党申请，支部也评议了，可一位市领导找我谈话：“老武呀，我看你在党外比在党内好，作用大，我们另有安排。”我不服，大声抗争：“我一生就这么个愿望，你还不让我实现。”我一生气就走了。

后来这位领导又找我，告诉我这是党的工作需要，对工作有好处，于是我就听了他的话。当时出于公心，并不知道后来安排我作为无党派人士进入市政协。

我当了17年政协副主席，17年内写了不少提案，大部分是关于城建、绿化的意见和建议。有的和一些现任领导的意见有矛盾，但只要对工作有利，对人民有利，为何不能提呢？

还有，政协一年要有十来次工作视察，每次我都十分认真，遇到不对的事，不符合政策的做法，不管是谁我都要提意见，都要

大声疾呼。有人说你老都老了，脾气不改。我为什么要改？出于公心嘛。

出于公心，就活得自在、自由、痛快，活得坦荡荡，不必长戚戚。我一生中别人发多少工资，我拿多少，从不过问。记得70年代中有一次调工资，5个领导有3个名额，大家一起开会，文件念完了，大家不吭气了。我第一个表态：我贡献小，不要了。这一来，别人反而不好意思，你推我让，最后很好地解决了。假如耍小聪明，做小动作，那既害别人也害自己，何苦呢！

有人问我，你管了这么多年城建，批了那么多地皮，怎么自己连一块巴掌大的地也没有，不后悔吗？不后悔！不是没有机会，是我不做。有人曾公开跟我讲：武局长，你多批一点地，我盖好了送你一套房子。我不要，我有房住。

有人问，老武你一生中获得过哪些荣誉，得到多少奖？我哈哈一笑，没有没有。我工作做好了，就安心了，何必要那些荣誉呢？我一生最隆重上台领奖，恐怕还是1983年2月，自治区领导为我颁发“高级工程师”证书，那我很高兴，这个资格是我干出来的，我称职，有这个能力，所以我高兴地上台，理直气壮地领了证书。如果我弄虚作假，我会心虚，就活得不自在。

第二，子女的事我不管。“儿孙自有儿孙福”，靠我不行，得靠自己。我小时候也是靠自己，尽管老父亲当年是个有声望的工商业者，但我走的道路跟他没有关系。

我的4个子女，二男二女，全是靠自己，或进工厂，或下农村，或进机关，都是他们自己努力的。他们成功了，我高兴；他们失败了，可以吸取教训重新来，这对他们有好处。假如他们压根就不行，你能扶持他一生吗？只有他们自己努力才会有出息。

第三，人要乐观，生活要甘于恬淡。不要老看不过去，也不